

朴宰雨 著

『史记』汉书记比较研究

· 中外学者学术丛书 ·

中国文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137号

责任编辑：张亚新 孙之龙

封面设计：韩 兵

《史记》《汉书》比较研究

朴宰雨 著

☆

中国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百万庄路24号)

邮政编码：100037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东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 1/32 印张14 字数320千字

1994年8月 第1版 1994年8月 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册

ISBN 7-5071-0262-9/I·213

定价：15.60元

中外学者学术丛书编辑委员会

执行主编：王 洪

委 员（按国别英文音序排列）：

马克林（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教授）

叶嘉莹（加拿大哥伦比亚大学教授）

梁丽芳（加拿大阿尔伯特大学教授）

傅璇琮（中华书局总编辑、编审）

杜维沫（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审）

朱靖华（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王 洪（特约总编辑）

李殿魁（台湾师范大学教授）

王保珍（台湾大学教授）

陈耀南（香港大学教授）

冯瑞龙（香港浸会学院副教授）

松浦友久（日本早稻田大学教授）

李炳汉（韩国汉城大学校教授）

成元庆（韩国建国大学校教授）

柳晟俊（韩国外国语大学校教授）

朴宰雨（韩国外国语大学校教授）

斯蒂芬·欧文（美国哈佛大学教授）

萨进德（美国马里兰大学教授）

序 言

《史记》与《汉书》是我国史学史上的辉煌巨著，也是我国文学史上的辉煌巨著。《史记》是通史，其记事是上起轩辕黄帝，下至汉武帝太初年间（公元前104—101），《汉书》是断代史，其记事是上起汉高祖元年（公元前206），下至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其间从刘邦建国（公元前206）到汉武帝太初末年（公元前101）这一段是相互重合的。而且班固在处理这段与《史记》重合的史实时，又没有完全另起炉灶，重新编写，而是不避嫌疑地直接袭用、或是改编袭用了《史记》中的许多东西。这一来就使得《汉书》与《史记》有了很大的可比性，人们通过这种比较，可以看出两个作家的政治立场、学术思想、历史观、文学观、写史目的、写作技巧，以及个人的情感、兴趣等许多方面的差异。一句话，《汉书》与《史记》是各自带着它们鲜明的时代烙印与作家自己的思想与个性之烙印的。

班固为了写《汉书》而继承《史记》的固有遗产，甚至大幅度的袭用《史记》的现成文字，我认为无可指责，我们只可能分析研究班固在这种继承、袭用、发展、改动的过程中哪些工作做得好，哪些工作做得不好，以及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现象等等。前些年我在指导学生读《史记》《汉书》时，曾给学生讲过一个题目叫《〈汉书〉继承、改动〈史记〉的得与失》，内容分两部分：

第一部分是《汉书》继承、发展了《史记》的成就，比《史记》更好了，这里面主要有六条：

其一是《汉书》的体例比《史记》更为严整、更为统一了。如《史记》中的《吕后本纪》只写了吕氏集团的兴亡史，名虽为“纪”，其实仍同一“传”；《汉书吕后纪》则叙写全国大事，真正成了“纪”体。同时又增加了《惠帝纪》，《景帝纪》也更为加详。班固还去掉了“世家”一体，又将《史记》中原来的单人传记进行了适当的归并，改编成《萧曹传》、《良平陵勃传》、《陈涉项籍传》、《韩彭英卢吴传》等。对于这些改法，尽管也有人提出过不同意见，但总的看来，不能不说是要比《史记》整齐规范得多了。

其二是《汉书》记载汉代的典章制度更为详细具体了。例如《汉书》的《百官公卿表》是从《史记》的《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发展来的，但是《史记》的年表只有“三公”，而《汉书》的表中则又增加了九卿。尤其重要的是《汉书》在该表的开头有一段很长的文字，叙述了汉代的官制沿革，这是非常重要的。又如《汉书》里的《外戚传》，开头又有一段文字叙述了汉代后宫里的制度与官阶，这同样也是非常重要的。又例如《汉书》调整《史记》八“书”，增加了《刑法志》、《地理志》、《艺文志》、《五行志》；又改《平准书》为《食货志》；改《封禅书》为《郊祀志》，从而使所包含的内容更加全面、更为丰富了。

其三是《汉书》多收经世之文，例如在《吕后纪》、《文帝纪》、《景帝纪》诸篇中加进了许多皇帝的诏令和群臣的上书，在《贾谊传》里收进了《治安策》，在《晁错传》中收入了《削藩》、《贤良对策》、《论贵粟》；在《董仲舒传》里收入了《贤良三策》等。这些文章不仅有助于读者认识当时国家的情势，而且也突出了作品所要表现的文章作者的思想与人格。例如，在《史记》的《屈原贾生列

传》里司马迁只收了贾谊的《吊屈原赋》与《鹏鸟赋》，这样贾谊在司马迁笔下就成了一个牢骚满腹的“怀才不遇”的文人；而《汉书》一收入他的《治安策》，作为一个政治家思想家的贾谊，这才被突出了起来。

其四是《汉书》补充了许多重要史实。司马迁是把汉文帝当做一个理想的皇帝来写的，对于汉文帝的许多作为，例如废除肉刑，司马迁都是毫无保留的热情歌颂。但在《汉书》中班固则指出了其名为德政，其实杀人更多的本质。又如武帝晚年的刑法之残酷，《史记》只在《酷吏列传》中一般地谈到了，而《汉书》则在《公孙贺传》里写出了一连串的宰相皆不得其死，以至于再让谁当宰相，谁就吓得趴在地上叩头求饶的情景，实在生动有力。又例如《汉书匈奴传》增加叙述了匈奴民族的前身獯鬻与周宣王发生战争的情景，并引用《诗经》中的篇章加以说明。《史记匈奴列传》不知为什么竟只字没有提到周宣王讨伐獯鬻的事情。

其五是班固驳正了司马迁的一些偏颇之见，突出了他要表达的某些思想。例如司马迁在《贾生列传》里说绦、灌诸老臣“排挤”贾谊，字里行间充盈着司马迁对贾谊“怀才不遇”的同情。而班固在《汉书》里则说：贾谊的许多意见在当时或稍后几乎都被皇帝采纳了，说贾谊“虽未至公卿，非不遇也。”再如晁错为巩固汉王朝的中央集权，建议并大力推行削藩，待至吴楚七国判乱时，以“清君侧”为名请诛晁错。汉景帝顶不住压力，背信弃义地把晁错杀掉了。司马迁在传后评论说：“语曰：‘变古乱常，不死则亡’，岂错等谓耶？”《史记》中的议论失衡，没有比这篇更为严重的了。班固在传后则说：“错虽不终，世哀其忠。”这显然就平允公道得多了。又例如司马迁说酈况协助周勃、陈平从吕禄手

中骗来北军兵符的做法是“卖友”，而班固则说：“为安社稷、救君亲，不得云‘卖友’。”这些见解都是很好的。

其六是《汉书》的文字虽然没有《史记》那么生动，但它简洁整饰，叙事明晰。例如《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里有一段文字是：

窦婴守荥阳，监齐赵兵。七国兵已尽破，封婴为魏其侯。诸游士宾客争归魏其侯。孝景时每朝议大事，条侯、魏其侯，诸列侯莫敢与亢礼。孝景四年，立栗太子，使魏其侯为太子傅。孝景七年栗太子废，魏其侯争不能得，魏其谢病，屏居兰田南山之下数月。

我们再看《汉书》的同一段文字：

婴守荥阳，监齐赵兵。七国破，封为魏其侯，游士宾客争归之。每朝议大事，条侯魏其侯，列侯莫敢与亢礼。四年，立栗太子，以婴为傅。七年，栗太子废，婴争不能得，谢病，屏居兰田南山下数月。

明代王懋对此评论说：“文不满百字，《汉书》删去三十余字不嫌简，此减字法也。”又如《司马相如列传》写卓王孙请司马相如到他家做客时说：“至日中，谒司马长卿，相如谢病不能往。临邛令不敢尝食，自往迎相如。相如不得已，强往，一座尽倾。”既然如此“不得已”，那么到了宴会上也就不应该再有什么过分积极的表现了，事实却不如此，当人们邀请司马相如鼓琴时，司马相如“为鼓一再行。是时卓王孙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谬与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前后的表现完全矛盾，实不可解。到了《汉书》中，班固更换了一个字，将其改为：“相如为不得已而强往。”

“为”者，“伪”也。原来前面的“不得已”，乃是故意装的，假撇清！实际上他早就迫不及待要去“勾引”卓文君

了。这个“为（伪）”字怎么能省！

以上是《汉书》发展、改动《史记》后的长处，但是《汉书》也有明显的短处，我也将它归纳成了六条：

其一是正统气、儒学气大大地增强了。在《史记》里，司马迁所体现的主要是先秦儒家大师孔子，尤其是孟子的精神，同时也吸取了道家、墨家、法家、兵家等诸家思想的长处。司马迁的思想是在先秦学术自由以及汉初的战国学术回潮的时代氛围的熏陶下发展形成起来的。司马迁对汉武帝实用主义的尊儒，以及被汉武帝所尊起来的以公孙弘、张汤为代表的卖身投靠的儒生，和那种专门为汉武帝的独裁专制做“缘饰”的新儒学极其反感，对于首先帮着汉武帝倡导尊儒的董仲舒也没有多少好感，只是在《儒林列传》里给他简单的写了几行，而且言语之间还不乏揶揄之意。但是到了《汉书》里情况就大大改变了，班固写《礼乐志》多本儒说，写《食货志》亦先引儒说。班固为董仲舒、公孙弘等都立了专传，并无限钦敬地称董仲舒为“纯儒”，夸颂董仲舒有“王佐之才”，甚至说他“伊吕无以加，管乐殆不如。”司马迁对汉代统治者是有许多批判的，而对于汉景帝与汉武帝的批判尤其厉害。而班固则不同了，他的“为尊者讳，为王者讳”表现得异常突出。这些问题在今天看来是班固的局限，但在当时班固却是公开以此为自豪的。班固曾明确地批评司马迁“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责备司马迁不能“依五经之语言，同圣人之是非。”这些是由他们各自不同的思想、立场，以及他们各自不同的写作目的决定的。司马迁写《史记》的目的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而班固写《汉书》则是为了“纬六经，缀道纲”。在班固“综其行事”，进行写作的时候，他是时刻注意“旁贯

五经，上下洽通”的。班固自觉地融汇汉代儒学，通过写史来为汉王朝“追述功德”，为汉王朝既定统治服务的目的性非常明确。

其二是《史记》有比较强烈的反天道、反迷信的思想，而《汉书》则相对迂腐。《史记》怀疑、否定“天道”的思想见于《伯夷列传》；司马迁生在“天人感应”邪说甚嚣尘上的年代，而对这种问题的揭露与嘲笑见于《河渠书》所述田蚡事与《儒林列传》所述董仲舒事。至于《封禅书》中对一系列方士骗人技俩的揭露，与对秦始皇、汉武帝迷信“神仙”，祈求长生不死的种种愚蠢行为的讽刺与嘲笑，就更为登峰造极了，《封禅书》是揭露欺骗，讨伐封建迷信的义正辞严的檄文。相比之下，《汉书》从这个水准上大大地后退了：他所新增的《五行志》，将自然界的一切变故一一地与社会人事加以比附，这篇文章与他所整理的《白虎通义》一样，可以说是东汉时代鼓吹“天人感应”、鼓吹封建迷信的最有力、而又最有权威性的文字了。又比如他在《霍光传》的后半部分写了许多奇怪现象，以预示霍氏家族行将毁灭的悲惨结局即将到来；又比如他在《张汤传》的“赞语”中说“汤虽酷烈，及身蒙咎，其推贤扬善，固宜有后”；又在《路温舒传》中说“路温舒辞顺而意笃，遂为世家，宜哉！”这是什么逻辑呢？宋代刘子翬说：“审如班氏所言，则比干谏纣、子胥谏吴皆不免刑戮者，岂其言不正耶？君有明暗宽暴，由其所遭有幸与不幸也。”在这些地方班固真像是有点被“因果报应”弄昏了头。

其三是对待下层人民的态度《汉书》与《史记》大异。《史记》的重视下层人民一是表现在为许多下层人物立传，如刺客、游侠、日者、滑稽、医生、商人等；二是表现在有

些传的传主虽是王侯将相，但助成他们一生功业的仍是下层人物，如侯嬴、朱亥、毛遂、冯谖等；三是对陈涉的评价高得出奇，他说：“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道而陈涉发迹。”竟然把陈涉列入了他心目中的大“圣人”的行列。到了《汉书》里，一部分固有的写下层人物的类传不见了；陈胜、项羽也都从“世家”与“本纪”里被拉下来合为一篇，真正成了给刘邦“清道”的先趋。班固指责司马迁“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得而羞贫贱”他认为司马迁所歌颂的朱家、郭解等是“以匹夫之细，窃杀生之权，其罪已不容于诛矣。”与司马迁的观点截然对立。

其四是《史记》的爱憎感情、主观色彩异常突出，而到《汉书》里则往往变成不动声色的“客观”叙述了。例如司马迁对于刘邦、吕后的杀功臣，对于韩信、英布、彭越等人的死，对于萧何、张良、陈平等入依违其间的种种表现，都是很有看法、很有感慨的。但到了《汉书》里，班固将萧何、曹参，张良、陈平、王陵、周勃，以及韩信、彭越、英布、卢绾、吴芮这么一分类归并，再把蒯通的事情从《淮阴侯列传》传里抽出来，去和江充、息夫躬另立一传；这样从物以类聚上说，是清楚整饰了，但司马迁原有的义意、感情，以及他故意流露于字里行间的许多要说而未能明说的话，也都通通不见了。《史记》里还有许多类似后来鲁迅作品里所常有的那种连类而发的火花四射，例如在《孟尝君列传》、《廉颇列传》、《汲郑列传》《魏其武安侯列传》等篇中所发的那种对于世态炎凉的谴责；在《范雎蔡泽列传》、《淮阴侯列传》、《李将军列传》、《韩长孺列传》等篇中所流露出来的那种复仇心理；在《伍子胥列传》、《蔺相如列传》、《陈涉世家》、《季布栾布列传》等篇中那种对于

人生观、生死观方面的表述；以及在《平原君虞卿列传》、《张仪列传》、《太史公自序》等篇中所表现的那种忍辱发愤、艰苦奋斗的思想等等。也正因此，《史记》形成了它在所有历史著作中的独一无二的抒情性，以至于后来被鲁迅称之为“无韵之《离骚》”。相比之下，《汉书》则完全不再具有这种性质。又比如《史记》的《李将军列传》是写李广及其整个李氏家族的悲剧命运，而班固将其与苏建合为一传，集中力量写苏武，突出了忠君爱国的主题，而原有作品的悲剧性以及对于汉代统治者批判则大大降低了。

其五是《汉书》比《史记》的生动性大大降低，在文学性上大步地后退了。例如《史记酈生陆贾列传》写酈食其在被齐王田广杀害前，还有与齐王的一段对答，以见其狂放豪迈的性格。班固写《酈陆朱刘叔孙传》时将其通通删去，遂使人物毫无生气地索然而终。《史记外戚世家》写窦太后的认弟一节，褚先生《补史记》写汉武帝的亲迎王太后的前女以及钩弋夫人的被杀，也都极其生动，而《汉书》加以删削，遂使故事变得平平淡淡。这方面的比较，前人已经作过很多。相比之下，《汉书》中这些从《史记》因袭下来的文章，虽然经过删削，与《史记》有了不同，但其炉灶毕竟还是司马迁旧有的样子，读者如果不仔细，可能还注意不到其间的差异。关于这种文章风格方面的事情，我们最好还是拿班固自己独创的后半部的文章如表现作为朝廷大臣的霍光、匡衡、刘向与作为杰出将领的赵充国、辛庆忌、陈汤等人的传记，来和《史记》中表现朝廷大臣与杰出将领的萧何、贾谊、晁错、卫青、霍去病、李广等人的相应篇章对比，这样我们才能真正看出二者之间的差别有多么大。《史记》是通过生动曲折的情节与冲突剧烈的场面来表现人物的性格，而

《汉书》则是通过平实的叙述以完成清晰的记事。《汉书》里倒也不是没有某些比较生动的故事情节和个性稍为鲜明的人物形象，但那仿佛不是班固追求的目标。即以常被人们用来举例的《霍光传》中的“太后听诏”与《陈万年传》里的“深夜训子”诸节来说，班固也只是勾画得比较明晰而已，《史记》中那种惊涛骇浪，大魔术师表演一般的情节场面，在《汉书》中再也见不到了。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最根本的我觉得是在于两位大作家的审美观与审美情趣的不同。

其六是《汉书》有些地方对《史记》因袭得不合理。如《史记留侯世家》的“太史公曰”有云“学者多言无鬼神，然言有物，至如留侯所见老父予书，亦可怪矣。上曰：‘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千里外，吾不如子房。’余以为其人计魁梧奇伟，至见其图，状如妇人好女。”这些都是司马迁个人的感想，而班固也将其移入《汉书》中，难道班固刚好也有与司马迁相同的思想过程？又例如司马迁在《大宛列传》的“太史公曰”中有云：“《禹本纪》言河出昆仑，昆仑其高二千五百里，日月所相避隐为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瑶池。今自张骞使大夏之后也，穷河源，恶睹本纪所谓昆仑者乎？”这也是司马迁个人的认识，而且也不见得正确。班固是从《大宛列传》中摘出有关张骞与李广利的事迹另立了一篇《张骞李广利传》的，居然也把司马迁的这段话移入了《张骞李广利传》。难道班固在这里刚好又和司马迁的想法一样了？而且《大宛列传》是以区域标名，故连带谈及黄河昆仑事，而在《张骞李广利传》的“赞语”中再发这种议论有什么必要呢？又例如司马迁在《汲郑列传》的“太史公曰”里引了翟公书门的所谓“一死一生，乃见交情”云云，这是司马迁在趁势抒发有关世态炎凉的感慨，结果班固也将其写入

《汉书》，而且不是放入“赞语”，乃是将其放在了汲黯、郑当时的传后，这一来就与前文完全不相连贯了。相反的倒是有一处十分重要的文字，班固是绝对应该抄入《汉书》的，这就是《高祖本纪》所写的垓下之战：“五年，高祖与诸侯兵共击楚军，决胜垓下。淮阴王三十万自当之，孔将军居左，费将军居右，皇帝在后，绛侯、柴将军在皇帝后。项羽之卒可十万。淮阴先合，不利，却。孔将军、费将军纵，楚兵不利，淮阴侯复乘之，大败垓下。”这是决定项羽最后命运的关键一仗，这段文字如果不写入《高祖纪》，而写入《项羽传》或《韩信传》，当然也是可以的。遗憾的是班固在这三个地方都没有写，在整个《汉书》里再也找不到这段文字，使读《汉书》的人无法知道“垓下之战”是怎么回事，这就大成问题了。我想这倒不应该怀疑班固的眼光，可能是他在抄写移动的过程中给搞丢了。

总之，《汉书》对《史记》的继承、改动，有得有失，二者各有所长，都是伟大的杰作。但比较起来，司马迁更突出的是才华；班固更富有的是学问。司马迁的思想解放，观点新颖，批判性强；班固则谨遵传统，奉行儒教，歌颂皇权。司马迁的文章是讲气势、讲感情，天马行空；班固的文章是讲材料、讲客观，细密周严。如果再用形象一点的话来打比喻，则司马迁好像是竺人里和李白，班固更像是杜甫；司马迁好像是军事家里的韩信、李广；班固则更像是程不识与赵充国。另外，从今天的观点看来，《史记》无疑更像是一部伟大的文学；而《汉书》则更像是一部严格的历史。

《汉书》来源于《史记》，但也从此开始转轨，从此更明确、更自觉地形成了中国封建“正史”的传统；而《史记》则是中国古代历史与中国古代文学尚未分流时代的渊海，是

从它那里开始分支，开始形成了中国后代的“正史”、以及后代文学里的传记、小说、戏剧等等，于是《史记》自然地也就成为文学、历史两个支派的共同的祖先了。

以上是我近十几年来给学生讲课的一些基本观点，是根据我研究《史记》《汉书》的心得感受，根据笔记卡片等整理出来的，但我始终还没有对《史记》《汉书》进行更细致、更具体的分类排队，进行条分缕析的一一比较，因此我的讲课无疑仍是即兴式的、粗线条的。1991年冬，我有幸认识了来中国访问的韩国的学者朴宰雨先生，他原是台湾大学毕业的博士生，多年来一直从事中国古典文学方面的研究。我们见面后，谈了许多有关《史记》与中国古代传记文学方面的事情，相得甚欢，相见恨晚。1993年秋后，朴宰雨先生又来中国，并到我们北京师范大学做客，于是又有幸见面畅谈了。这时他拿出了一部即将出版的《〈史记〉〈汉书〉比较研究》的校样给我看，并请我给这本书写个序言。朴先生如此盛情，我当然不能推辞，而且我也愿意作这本书的第一个读者，以便从中学得更多的东西。朴先生的这本书首先分析总结了历代研究“史汉异同”的状况，涉猎该博，条理清晰，使人一览之下，顿时将这一部分学术史了然于心。接着这本书便从“史汉总体”、“史汉传记文的编纂体例、形式、人物”与“史汉传记文的写作技巧”三方面将《史记》《汉书》的相关部分条分缕析地一一进行了详细勘比。其用功之勤，其思虑之细，其所表述的观点之准确明晰，都是很令人叹服的。例如朴先生将《史记》《汉书》所显示的各自作者思想倾向的区别概括为“《史记》通变古今与《汉书》尊显汉室”；“《史记》兼尊儒道与《汉书》独尊儒术”；“《史记》兼顾民间与《汉书》倾向上层”；“《史

记》感情移人与《汉书》不失客观”四条，真是归纳得既全面，又扼要。又例如朴先生将《史记》《汉书》中的所有传记文分别归结为“世系中心型集体传记文”、“国史中心型个别传记文”、“人物中心型个别传记文”、“人物中心型合体传记文”、“事类中心型集体传记文”、“中外关系中心型族别传记文”、“叙传”、“附传”共八类，这就把《史记》《汉书》中除去“表”、“志(书)”以外的所有写人叙事的篇章通通概括无遗了。这是朴先生的在前人研究基础上的新发挥、新创造，我觉得这种概括是很明确、很切合实际的。朴先生的这本著作中既汇集了古今中外许多学者的研究成果，又独自下苦功进行了许多勘核统计，其材料之丰富、其数据之翔实，都是少有其比的。中国从晋代开始便有人对《史记》《汉书》进行比较研究，以后便代不乏人，近十几年来相继又出过一些这方面的论文与专著，总的数量应该说是不少了。由于各自研究的目的方法不同，所以各有各的成绩，也各有各的不足。但是像朴宰雨先生这样既有宏观，又有微观；既有理论概括，又有具体材料的偏重于文学方面的研究著作，似乎还没有见过。朴先生的这本书定将给以后的《史记》研究、《汉书》研究，以及《史记》《汉书》的比较研究提供一种新的巨大的方便。朴先生是韩国人，作为一个外国人，能对中国的古代文化有如此深厚的感情，并能对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作出如此的成绩，这实在是让我们中国的学者深为敬佩的。韩国是中国的友好邻邦，韩国与中国早从先秦时代开始就有非常紧密的文化往来，我们相信朴先生的这本著作在今后韩国与中国的文化交流上也定能显现出其不可忽视的作用。

北京师范大学 韩兆琦 1994.6.30.

目 录

第一章 绪 论..... (1)

第一节 《史》《汉》异同研究史略..... (1)

第二节 研究动机、对象及方法..... (20)

一 研究动机..... (20)

二 研究对象..... (21)

三 研究之进行与方法..... (22)

第二章 《史》《汉》总体比较..... (24)

第一节 著者与写作背景..... (24)

一 时代背景..... (24)

二 家学渊源、生平与成书过程..... (27)

三 写作动机..... (39)

第二节 《史》《汉》所显示作者之精神

倾向..... (51)

一 《史记》通变古今与《汉书》尊显

汉室..... (52)

二 《史记》兼尊儒道与《汉书》独崇

儒术..... (54)

三 《史记》兼顾民间与《汉书》倾向

上层..... (57)

四 《史记》感情移入与《汉书》不失

客观.....	(61)
第三节 《汉书》各篇承袭《史记》之概要.....	(67)
一 《史》《汉》在时期上重复之篇.....	(67)
二 《汉书》袭用《史记》之篇及其各种 情况.....	(71)
三 《汉书》各篇承袭《史记》之情况 概述.....	(75)
第三章 《史》《汉》传记文之编纂 体例、形式、所传人物 比较.....	(164)
第一节 《史》《汉》传记文编繁体例上之 特性.....	(164)
一 《史》《汉》同为纪传体.....	(164)
二 《史记》通代与《汉书》断代.....	(166)
三 《史记》本纪与《汉书》纪.....	(168)
四 《史记》世家、列传与《汉书》传.....	(174)
五 其它体例.....	(200)
第二节 《史》《汉》传记文之形式及所传 人物.....	(228)
一 《史》《汉》传记文形式之分类.....	(228)
二 《史》《汉》传记文所传人物.....	(243)
第四章 《史》《汉》传记文之写作 技巧比较	(298)
第一节 《史》《汉》传记文与写作技巧.....	(298)
第二节 布局.....	(304)